

(上接第一版)

杨毅庵要求戴逸在《中国人名大辞典》等书籍中查找、搜集古代文士诗人的小传，然后用钢板刻印，装订成册，发给同学们参考。不久，他就成了杨老师的“助教”，有空就帮老师查寻资料、抄写作品。杨先生对这位翩翩读书郎也格外器重，每到寒暑假，就将戴逸等几位拔萃之才叫到寓所另开“小灶”，讲授《左传》《诗经》《荀子》《庄子》和《昭明文选》。

一个甲子后的今天，戴逸依旧清晰地记得杨毅庵先生将“一篇文章之新，用笔之妙，炼句之工，用字之切，讲得头头是道……我们最喜欢听杨先生吟诗诵文，抑扬顿挫，声遏行云，真正是美的享受”。也就是在这时，杨毅庵还要求戴逸他们要学会做读书笔记，凡所学所得所思所想都要记下来，并教导他们学习古文贵在多读多思，弄懂弄通，如此才能将所学知识熟谙于心，经年累月，必有大益。正是在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戴逸养成了日耕不倦，笔不停挥，思不辍歇的良好习惯。这也成为他勤于读书，直至著书立说的成功法则。

由于自幼便养成了读书必做笔记的习惯，戴逸在从事专业研究和教学工作后，“顺利成章”地作了上万张资料卡片、近一百本读书笔记。无论治学治史，他都时刻留意来自各方面的各种信息，将它摘记下来并细加分类，作为研究之必备。

他告诫学生，别看轻这一张张卡片，这可是资料的汇聚、知识的积累，天长日久，积聚得多了，就可发现这是提供写作的富矿。所谓旁征博引，就是要言之有据，靠资料说话，这是做学问的良策，一定要持之以恒。荀子言“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 学生时代两办图书室

戴逸自幼酷爱读小说，小学时就能将《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名字、诨号背诵无遗。课余时间，他与同学常将一百零八将的名字、诨号相互考问，比谁答得对、答得多，戴逸总能在小伙伴的欢笑声中力拔头筹。

让戴逸难忘的是，小学毕业时，他因学业成绩不理想，与另一位同学差点成了留级生。当时，他因为在家中沉溺于阅读弹词小说《天雨花》，竟然懒得去领成绩单。好在校长法外开恩，给他们送了个“毕业”。

抗战爆发后，戴逸随父亲和姐姐避难沪上爱文义路。说来也巧，被戴逸尊称为“瞿老爷”的瞿启甲一家也租住在爱文义路，与戴家仅相隔四五户人家，故两家仍然时相过从。初到上海时，戴逸失学在家，但读书的诱惑力与日俱增。半年后，他终于有了读中学的机会，且和几位学业优秀的同学坐在一起，读书的灵感一下子喷薄而出，尤其是他的语文、历史的成绩在班上名列榜首，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后起之秀。

1942年，戴逸转学常熟省立第七中学。高中三年，他的求知欲

之旺盛，犹似春笋拔节。在完成各门课程后，他依旧迷恋于古城那几家仅存的古籍书店。这些书店为招徕顾客，允许读者在店里随便看书，但没有座位。书店虽然没有珍稀版本，但对一个中学生来说已是知识殿堂和兴趣乐园了。戴逸站着阅读各种经史子集、诗文词典，尽管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但他流连忘返，遇到特别喜欢的书总要想办法买下。

除了旧书店，他还去图书馆读书。常熟虞山山麓有一座昭明太子读书台，台旁矗立的图书馆，是戴逸青少年时代经常光顾的乐园，他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他与图书馆工作人员相熟后，有时能破例借了书回家里小楼阅读。

家里的那座小楼，是前人利用钱谦益私家花园中的石舫改建而成，还曾是归允肃状元的宅第。在这里，戴逸似有文魁相助，遍读四书五经、《左传》《史记》《文选》、唐诗、《古文观止》等经典，许多篇章都能背诵如流。青灯黄卷，伏案夜读，手握彤管，朱蓝煞然，在浓密圈点中怡然自乐。

戴逸那时梦寐以求的是能得到一部《昭明文选》，可他囊中羞涩，可望而不可得。一次，旧书店到了一部《昭明文选》，版本很好，却因少了几卷而鲜有人问津。戴逸认定机不可失，把积攒下来的零用钱拼拼凑凑，终于将这部宝籍捧回家里。他设法借来完整的版本，整整一个月闭门不出，工整抄写，又仿线装书装订成册。戴逸还买了不少特别喜欢又价格优惠的古籍。日积月累，至高中时期，他已拥有近两百册线装书、平装书，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小小图书室。为此，瞿启甲先生送了他一本线装本《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对戴逸的读书藏书加以褒奖。

1946年秋，一次偶然的机会，已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了两年的戴逸，出于对历史研究的嗜爱，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北京大学史学系。来到北京后，北大浓厚的学习氛围，良好的学习环境，雄厚的师资力量，使戴逸如鱼得水，尽其其欢。在这座称鼎中华的学术殿堂前，他立志献身于学术研究。他向北大教授们问学求知，过从甚密。由于他虚心好学，学业日进，每次考试，各门功课成绩均列前三名。

时光到了1947年夏初，日见衰颓的民国政权风雨飘摇，爱国民主运动高潮迭起。崇尚正义、追求光明的北大学生通过募献，筹办以曾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字号为名的“子民图书室”，戴逸被荐举为常务总干事兼编目股长。经过多方努力和支持，赠书愈来愈多，其中有不少是在解放区出版的革命书籍。

书多了，原来向校方借用的一小间房子显得愈加窄小，亟需调换大一点的房子来添置书架、安装照明设备等。为此，戴逸除做好分类编目工作，还于194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专门拜访了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

胡适对戴逸的好学已有所耳闻并颇为赞赏，见面之初显得和蔼可亲，但当他慢慢听完戴逸所述因由和所提要求，不由沉思良久，联想到全国各大中城市持续



戴逸先生在家中审阅稿件



1951年，北京新潮书店出版的戴逸著《中国抗战史演义》。

不断的学潮，便以师长口吻训导说：“学生的任务是专心读书，不要精力外骛，搞那么多课外活动。你们的小图书馆还是不办为好。”戴逸和同学们自然要抗声争辩，最后双方不欢而散。

那天，时为北大秘书长兼史学系主任的郑天挺先生恰好在场，虽然当时未说什么，但戴逸感到事后郑天挺发挥了作用，因为没过几天，所提条件大多得到落实。

“子民图书室”终于如愿开放。戴逸除了担任图书室常务干事外，还被同学们推选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

## “当年苦攻处女作”

戴逸的处女作不是清史而是抗战史，写这部书时他才二十三岁。一段愤恨的回忆、激情的萌发与偶然的机遇，使戴逸有机会小试牛刀。

1937年，戴逸小学毕业。就在此前后，日本政府将全面侵华的战火从华北烧到江南，口出狂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无法忘怀的屈辱与愤怒。

追怀当年，他不胜感慨：“可以说我青少年的‘花季岁月’是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下度过的，饱受难以笔述的欺凌和苦难。”

1937年8月的一天，戴逸在大东门外亲眼目睹六架日机肆无忌惮地轰炸常熟县城。这次轰炸中，市中心方塔附近的民房、学校、尼姑庵成了轰炸的目标，南门外市场更是死伤了很多。

抗战期间，戴逸父亲被抓去关押在苏州达两年之久。一位堂兄因参加新四军，在战斗中负伤被俘遭枪杀，另两位堂兄为此受株连而下狱。表哥是南京附近的游击队长，在争取伪军反正时因谈判破裂遭日军枪杀。姐姐则因与重庆的同学通信，被日军宪兵队查获后传讯，虽获保释，但勒令不得离开常熟城……他还亲眼目睹的同学绑走。

被老百姓称为“常熟之狼”的日本宪兵队长米村春喜，还曾带兵去戴府搜查。当时，一名新四军战士在“清乡”中因伤在他家门楼

上躲避，幸未被发现才躲过追捕。所有这些，都在戴逸心中升腾起愤恨之火、复仇之火。

1948年8月，戴逸在北大参加学生运动而遭到政府通缉。不久，在中共地下党的保护下，戴逸脱离虎口来到解放区，在中共创办的华北大学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作了系统学习和研究。毕业后，他留校工作，担任中共党史专家胡华教授的助理。

撰写《中国抗战史演义》，则是戴逸受人启示而情不可抑。

新中国成立伊始，戴逸读到一本用章回体写成的解放战争史，从而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首先，章回体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民国演义》及《水浒传》《说岳全传》等本来就是他自幼手不释卷之所爱，对写作技巧已谙熟于心；其次，关于抗战历史尤其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史，包括他自己在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他常感不吐不快。此外，跟随胡华教授系统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他感到应该检验自己学习水平的时候了。

确定写作方案后，戴逸几乎每日沉浸于写作之中，一个月就完成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的六年抗战史，分列八回，约四万字。后因工作繁忙，他曾两次中断写作近一年之久，但热情不减，一有机会就埋头写作，甚至连恋爱的时间都花在写作上。书稿随着思路的延伸而在笔下纷飞盈积。《中国抗战史演义》的写作，当时既无人要求，也没想到出版，他只是将人民群众的苦难、中国军民英勇抗争的历史和日军种种血腥暴行记录下来，作为自己的一次练笔、一次习作。

戴逸的写作得到了胡华教授的热情指导和鼓励。新中国成立不久，长期在国统区生活和工作的百姓因受生存环境和视野的限制，对逝去不远的中国抗战史的了解仍十分有限，因此急需这方面的宣传读物。北京新潮书店向胡华求助，希望他能帮助组织和介绍这方面研究成果。已读过《中国抗战史演义》部分书稿的胡华便要求戴逸抓紧撰写。受命之下，戴逸废寝忘食伏案疾书，终于在1951年初春交出了这份处女作书稿。此书很快出版面世，不胫而走，购书者络绎不绝。从当年3月

初版至7月，先后三次印刷，累计印数达两万册。由于仿照章回体小说写作，可读可讲，引人入胜，全国多个省级广播电台作了连续播讲，广受听众好评。北京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还专门约谈戴逸倍加嘉勉。

《中国抗战史演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强占东北落笔，至1945年中国人民夺取抗战最终胜利收尾，全书三十回、十五万字。虽说这是一本历史演义，但戴逸并未刻意追求章回篇目在文字上的工整对仗，而是力求标题醒目准确，许多重大事件能在标题上得到体现。对重要历史事件的介绍，他均以权威史料为参考，做到事出有据，史料详实，观点鲜明，文风活泼。读者在重温历史的同时，也可看到作者文字功底的笃厚和史学知识的广博。

忆及于此，戴逸说：“当时抗战过去不久，却没有一本全面真实地描写抗战全过程的著作。全国人民都殷切期望了解这段历史的真相，而此书是演义，虽陋拙，却填补了空白，满足了大家的愿望。”言辞中流露出辛勤耕耘后的收获感。

至于为什么作品并未落款戴逸而署名王金穆，他解释说，“金穆”是他在学生时代投稿所用笔名，“王”是母姓。显然，将处女作以“王金穆”署名，无疑珍藏着戴逸感恩母爱的深情。

## “读书只为解忧计”

1948年，戴逸进华北大学学习后留校任教。1950年10月，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成立。1955年，戴逸被评定为最年轻的副教授。在这里，他既是胡华教授的得意弟子，又是校长吴玉章的学术秘书。他先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后又研究中国近代史和清史。由于他潜心学问，勤于笔耕，有思想、有见地，深得名师名家的关爱器重，多次被中宣部、北京市委宣传部临时借调参与重要文稿的写作。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对他都有良好印象。但所有这些，在“文革”中全都成了戴逸的罪名。

(下转第三版)